

代表工作室恰恰是为了收纳民意

不让代表设工作室难称进步 2010年8月25日 青年时报 高永峰

青年时报一评

代表法自1992年颁布以来,人大代表履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,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恐怕是人大代表面对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,如何开创性地履职,为此,一些地方人大代表就设立了个人工作室。此次代表法修正案正是对这一最新动向作出了相关规定。李适时主任的解释理论上没错,但也应看到,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日趋密切,从方便选民联系代表的角度出发,仅仅依靠各级人大常委会这一唯一的中介联系,既不方便,也不高效。

事实上,很多人大代表在履职方面都存在“两会上露露头发言鼓鼓掌,两会后难觅仙踪”的问题。究其原因,除了一些代表参政能力有限外,还跟他们分身乏术,难以在本职工作与人大代表职责之间寻得平衡点有很大的关系。在现行制度

下,人大代表其实是“光杆司令”,凡事都要亲力亲为,如果只是偶尔为之的社会活动尚能应付,一旦选民热情高涨起来,纷纷向自己的代表寻求帮助、主张权利之时,代表必然力不从心。

目前出现的代表个人工作室,也只是进化未完成的民主政治半成品。但若按此趋势发展,个人工作室将进一步发展演进为代表办公室,形成由秘书、助手为紧密层的人大代表工作团队。而这个推演的过程,也应该是代表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得到发挥、履职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过程。为此,在代表法修正案草案尚在审议阶段之时,郑重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审视基层人大代表的创新之举,为代表能与群众更紧密联系创造条件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人大代表设立自己的个人工作室,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创新,但现在却遭遇亮红灯的可能,无法不

令人扼腕。让人不明白的是,该修正案的核心精神是激励代表主动履职,试图扭转以往人大发言时出现的“哑巴代表”现象。这里,精神和规定出现了悖反,因为那些代表正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职务,才创造性地设立了个人工作室。回顾1992年颁布的《代表法》,其中有对人大代表这样的要求,“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,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”。如果这不是一句空洞的表白,那些个人工作室不正是为了有效地接触民众、收纳民意吗,如果把它们取消,岂不和18年前对人大代表的要求唱反调。

请看该规定提出的理由:“鉴于中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、工作机构是代表履职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,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。”让人不解的是,既然只是代表的一个服务班子,它怎么可能向代表提出这样的要求呢?

农民被城市化就是一桩生意

山东诸城率先撤销全部行政村,小村庄合并成大的农村社区,引导农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,专家认为纯农区不适合搞集中居住,不应强制农民“被城市化”。

(8月26日《广州日报》)

农民“被城市化”背后的真问题 8月27日 浙江在线 谭浩俊

浙江在线一评

农村要变成城市,农民要变成市民,决不是建几幢高楼、建几个居民小区、把村庄改名叫社区那么简单。如果不顾农民意愿,不切合农村实际,强制把农民“被城市化”,各种问题就会积重难返。

那么,一些地方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撤村建区、让农民“被城市化”呢?也许,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忽视。一方面,强制撤村建区、把农民集中到一起居住和生活,很容易产生视觉上的美感,形成新农村建设上的政绩;另一方面,由于国土资源部出台了“城乡建设用地挂钩制度”,一旦将村庄强制合并、将农民合并居住,可以产生用宅基地换建设用地的效应,对急需大量建设用地的地方政府来说,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。至于农民集中居住以后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,是否有后遗症,比起眼前的政绩来,是可以“忽略不计”的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此举不免让我想起上个世纪的人民公社吃食堂。政府果然是全能型的政府,说不让你在家吃饭,你就得家无口粮去吃食堂。后来,吃不下去了,食堂散了。再后来,撑不下去了,公社也散了。又后来,土地承包了,虽然没有所有权。现在呢,不叫农民吃在一起了,却叫农民住在一起,美名为社区。问题是,凭什么你灵机一动,农民愿意不愿意,都得住在一起。千百年以来,农民都是以村落为单位,现在却要把它像城市一样小区化。只是这个社区化的过程是以政府为主导,看起来是服务农民,但其实却别有用心、另打算盘。

很明显,地方政府的计策是腾笼换鸟。以社区为名,用一幢幢楼房将村民圈起,以少易多,那些星罗棋布的宅基地,统统到了政府手里。土地资源的紧缺和土地财政的依赖,使得许多地方政府把目光盯在了村民的宅基地上。诸城当局已经做过测算,如果农民全部实现集中居住,则可置换出8万亩旧宅基地。政府得手之后,用于复垦,同时置换出同样数量的土地,用以建设特色产业园区。这是一笔生意,8万亩宅基地得手,所费几许,8万亩产业园区出让,所得几多。让农民失地,还说是服务农民。谁是其中的受益者,不言而喻。

委员不懂议政的病根在选拔机制

政协委员无所作为责任在谁 2010年8月25日 广州日报 屈正州

广州日报一评

政协出现一些“不懂议政”的老板委员,与政协委员的产生机制有关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伟岳曾说,每次换届,“一直到电视台宣布我才知道,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当”。在这种产生机制下,候选委员是否具备相应的政治素养和参政议政的专业素质,并未受到足够重视。

但另一方面,老板委员在政协会议上噤声,正如广州市工商联党组书记谢春潮所说,一些人心存顾虑,以为议政是挑毛病,揭伤疤,是得罪人的事,不敢也不便议政。这也与企业在社会的生存、发展氛围不无干系。老板委员的“本职工作”多是非公经济体的掌门人,试想,若有“老板委员”真想畅所欲言,他能不顾忌那些批评相关职能部门的言论会形成“反杀伤力”吗?我们当然希

望政府官员能有忠言逆耳的大度胸襟,来诚恳听取这类建言,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,但个别政府部门及官员真有听取逆耳忠言的雅量吗?能保证不给“犯上”的“老板委员”及其企业“穿小鞋”吗?

故而,对“老板委员”在政协无所作为的现象应辩证地看待。期待政协委员真正参政议政、建言献策,既需要完善政协委员的选拔机制,更需要创造让政协委员畅所欲言的参政议政氛围。这样,光荣而神圣的政协委员才能真正实至名归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政协委员不懂议政,并不让人奇怪。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,我们已经见识了那位倪萍倪委员。她本来就不是冲着议政去开会的,当然开会时举手、鼓掌都是她的权利。问题在于,如果真的让她议政,除了鼓掌和举手,她是否有相应的议政能

力,这还得看她是否具备国家政治领域中的公共知识。从她后来为自己辩解的话语不难看出,在这方面,她还真是有些欠缺。像倪氏这样的委员,不是个别,而是一种现象。广州这位政协副主席的言谈,谈的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却又无以解决的老问题。

政协是国家政治权力机构之一,任何一个委员都需要相应的参政议政方面的知识,才能胜任其权力行使。以前曾有舆论将政协和欧美国家的参议院相比,如果它们真的可比,那么,欧美参议员们之所以成为参议员,不会是因为歌星、冠军和老板,而是由选举产生的专业政治人(它不是任何一种荣誉)。这里就涉及本土政协委员的选拔机制,我不知道成为委员的门槛有多高。但至少在让其进入前,应该考量对方是否有议政的兴趣、知识和能力,并逐步将此民选化。

真正的维稳必须从制约权力入手

花大钱成立维稳“飞虎队”有用吗 2010年8月27日 红网 李立君

红网一评

廉江市委书记许顺说,“事实说明,稳定能买!”这很牛,任何一个能将政治问题变成经济问题的人,都很牛。在廉江市委书记许顺的眼中,所谓稳定,就是没有贼,没有人闹事,不出现群体性情况,也没有人上访。这些都消失到哪里去了呢?都在家里憋着呢,像平静的海面下面的一股暗流。不稳定的因子只是被压制了,却没有被消除。

维稳不是压制,而是化解,属于政治范畴,政治的本意就是不同观点相互之间的妥协,最终达到一个利益共同化的过程,维稳不是除了被窝里到处都安上摄像头,不是阻止上访,更不是安置些像“东厂”一样的“哨子兵”。它是一个将冲突转化为秩序的过程。

各个团体把利益要求价值化,就可能在不同的团体之间,通过价值讨论来平衡各方的利益,利益冲突不

可避免,但却可能讨论出共同接受的某种价值,所以社会团体的活跃有利于稳定社会。维稳是需要钱的,但维稳又是钱买不来的,因为,维稳是一个政治问题的理解,而不是政绩的追求,不是单纯追求没有人上访、没有人打架等等社会表面化的问题,而是一种形成自觉秩序的过程。政府应该鼓励民间组成各种社团,将社会问题提升到价值问题层次,满足多元化的利益,这才是维稳的根本。另外,永远把大众看成刁民的政府,永远不会形成现代公共管理理念,而只能出现这些花钱买维稳的管理思维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“事实说明,稳定能买!”这位市委书记果然大手笔。那么,稳定的价格呢?一个县级市2009年的维稳经费就开销了3100多万,是过去5年投入的总和。以此类推,一个国家呢?5月份的《社会科学报》有报道:据权威数据显示,2009年维稳财政

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:全国内保费用达5140亿元,已接近军费开支。我们知道,这叫“天价维稳”。

廉江市的维稳方式之一,是创建包含340名成员的“飞虎队”。报道上有照片,那是两排全副武装的摩托车队,打着两面大旗,可谓浩荡。再看今年早些时候重庆的报道:重庆警方今年成立一个新警种,叫“交巡警”。它由4000名警察构成,配备150辆警务车昼夜巡逻,保证在市区任何一个地方出事,能够做到3分钟集结,5分钟到场。这显然不是常态的治安。我不知道,如果满街都全副武装,是让人有安全感,还是没有安全感。

这些年群体事件飙升,政府遂有维稳之说。可是那些群体冲突,大都因征地、拆迁而发生,这里有着太多的权力对权利的侵害。如果我们的权力能够有效受到法的制约,本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发生,真正的维稳应该从这里入手。

8月23日,代表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。草案明确规定代表不得设个人工作室。草案建议增加规定,代表不脱离各自生产和工作岗位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表示,鉴于中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、工作机构是代表履职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,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。

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谈到:一些委员既不敢批评又不敢拿出措施,“钱是很多,但不懂议政”。工商联党组书记谢春潮也表示:一些人心存顾虑,以为议政是挑毛病,揭伤疤,是得罪人的事,不敢也不便议政。

(8月24日《广州日报》)

从来四平八稳的人,要是突然变成前卫的创新派,就很有颠覆性,可能是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比如,广东廉江市财政较困难,但2009年仍投入3100多万元用于综治信访维稳,是过去5年投入的总和,并创建包含340名成员的维稳“飞虎队”,最具创新精神的是,每一条街道都安放“哨子兵”。

(8月25日《南方日报》)

本版特约主持人 邵建

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,专栏作家